

1892年后中朝关系由冷变暖的原因探析

张礼恒

内容提要 朝鲜在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后,就开始了挑战宗藩体制,争取民族独立的艰难历程,先是依靠日本,继而援引俄国,后又依附美国,最终制造了危及中朝宗藩体制的“朴定阳案”,致使中朝关系降到了历史的冰点。但终因“不沾不脱”原则挤压了朝鲜争取自主活动的空间、美国口惠实不至的作为和严重的财政危机,自1892年起,中朝两国关系迅速回暖,重新进入了“蜜月期”。

关键词 “朴定阳案” “不沾不脱”原则 “巨文岛事件”

张礼恒,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252059

溯顾近代中朝关系的历史则会发现,从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起,朝鲜就开始了挑战宗藩体制,争取民族独立的艰难历程。先是依靠日本,继而援引俄国,后又依附美国,最终制造了危及中朝宗藩体制的“朴定阳案”^[1],致使中朝关系降到了历史的冰点。从1887年8月到1891年12月,朝鲜顶着巨大的压力,首次派遣全权公使驻扎美国,此后又不顾清政府的反对,免罚朴定阳,且授予其高官。然而,此后的中朝关系却出现了极不合逻辑的一面:中朝关系迅速回暖,两国关系重新进入“蜜月期”。对于中朝关系自1892年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的这种虽不合逻辑却客观存在的现象,目前国内学术界已有的研究,基本上是无视或闭而不谈^[2]。有鉴于此,笔者试对中朝关系时处历史拐点

本文为2013年山东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从闭关到开放:朝土视察团研究”(13BLBSJ02)阶段性成果,并获得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的资助。

[1]张礼恒:《“朴定阳事件”与中朝之间的外交纷争》,(北京)《当代韩国》2010年秋季号。

[2][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张汇文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商务印书馆编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韩]姜万吉:《韩国近代史》,贺剑城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出版社1985年版。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孙克复:《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上的这一“反常现象”进行探讨,以期深化近代东亚国际关系的研究。

一、“不沾不脱”原则挤压了朝鲜争取自主活动的空间

清代中朝宗藩关系自1637年确立以来,中朝两国恪守东亚地区国家相处的传统,清朝作为宗主国,享有册封之权。朝鲜身为藩属国,勤修职贡,定期遣使来华,以表臣子之仪,成为宗藩关系的典范。乾隆皇帝于1778年10月赐书“东藩绳美”^[1],当是对中朝两国关系的最好诠释。1861年2月,朝鲜哲宗国王派出热河使千里覲见咸丰帝,更让后者倍感快慰,称赞朝鲜“一心事大之诚,深可钦叹,真是礼义之邦”^[2]。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宣告了数千年来中国中心时代的终结,昭示了中国已经由事实上的东亚中心和冥想中的世界中心沦为西洋诸国的边陲。中朝宗藩关系面临着东西方列强的全面挑战。作为对东西方列强挑战的回应,中国在诠释中朝宗藩关系的问题上,经历了一个从遵循传统到逐渐调适的过程。史料显示,截止到19世纪80年代前,中国政府宣讲中朝宗藩体制的内涵时,皆秉承这样一个说词:“朝鲜虽系中国之属国,其一切政教禁令,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向不与闻。”^[3]

此种解释遭到列强的质疑与挑战。为了破解宗藩体制与条约体系之间“二重外交体制”的难题,全面主持清朝朝鲜事务的李鸿章于1882年3月28日,首次向世界阐明了中国的对朝原则——“不沾不脱”^[4]。该原则的主旨有二:其一,中国维持中朝宗藩关系是出于对历史传统的秉承,绝无领土野心,更不会像东西方列强那样,侵吞朝鲜土地,灭绝朝鲜之国。其二,表明捍卫中朝宗藩关系的坚定决心与意志,正告东西方列强,如果胆敢入侵朝鲜,损害中国的在朝利益,中国将不惜通过战争来维护。

该原则提出后在外交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国际效应。1882年8月,中国出兵朝鲜,平定“壬午兵变”;1884年中国驻朝军队,镇压“甲申政变”,都获得了欧美国家或明或暗的支持与理解。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欧美列强承认或默许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几成共识,最典型的当属英俄在“巨文岛事件”(1885年4月-1887年2月)中对中国在朝宗主权的公开承认,中国据此扭转了中日《天津条约》后的被动局面,重新操控了东亚外交的主动权,强化了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中朝宗藩体制。追根溯源,中国外交上的成功,无不与李鸿章提出的“不沾不脱”原则有密切关系。“不沾不脱”原则,是对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的成功诠释,是近代中朝关系的现代性转换。

“不沾不脱”原则的提出,大大挤压了朝鲜争取自主活动的空间。朝鲜从19世纪80年代起,在“小中华”意识的作祟下,更在列强各国的教唆、鼓动下,开启了摆脱宗藩体制,争取独立自主的跋涉历程,并将派遣驻外使臣作为首选,史称:“韩王近年来视派全权为自主发轫之基”,“久谋自主”^[5]。1882年11月2日,幼学高颖闻上书国王李熙,提出“目下急务”七条,其中第一条就是“派遣使价于欧西各邦,先觐国风物土,以伸友谊,次请精娴各艺教师,使我八域上下,学习新务,野无遗贤,是昭代开明之一道”^[6]。此事尽管没能即刻付诸实施,但埋下了5年后“朴定阳事件”的伏笔。基于自身力量的弱小,朝鲜采取了“以洋制华”的策略,“以使洋人挟制华官为得计”^[7],将摆脱宗藩体制、争取独立自主的希望寄托于列强的支持上,先是依靠日本,次是援引俄国。但经过观察、比较,发觉日本、俄国、英国皆非善

[1]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667页。

[2]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十二),第5168页。

[3]郭廷以、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版,第97页。

[4]张礼恒:《近代中朝关系的现代性转变——论李鸿章的“不沾不脱”原则》,[北京]《清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5]《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5卷,第2745页。

[6]〔韩〕李光麟、慎镛夏编著:《韩国文化史》(近代篇),[韩国]一志社,1984年,第436页。

[7]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2页。

类,或有领土要求,或有更大企图,都非值得依赖、依靠的对象,只有大洋彼岸的美国与众不同。美国作为后起的大国,出于全球争霸战略的考虑,亟待打破东亚地区的原有格局,彰显美国影响的存在。朝鲜谋求独立的企图恰好给了美国插手东亚国际事务的良机。美国人初到东亚,以公平、正义相标榜,颇获东亚国家的好感。史称:“美国比欧洲诸国最为公平顺善,又富于财,无贪人土地之欲。”^[1]“韩人素喜美人善谈自主。”^[2]1883年5月13日,福特(H.Foote)成为美国首位驻朝公使。据此,美国成为近代第一个向朝鲜派驻公使的西方国家,率先承认了朝鲜的独立国家地位。同年7月,受国王李熙的派遣,闵泳翊率领由开化党骨干洪英植、徐光范、边燧等组成的报聘使团来到美国。此后,美国人纷纷担任朝鲜政府的要职。墨贤理出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德尼被聘为朝鲜政府顾问,厚礼节任朝鲜驻纽约总领事^[3],米孙被委任为襄办事务^[4]。医生敖兰“经医进官,升参判,每持议背华自主,昨派为驻美参赞”^[5]。

朝鲜视美国人的公开支持如大旱云霓,从而加快了挑战中朝宗藩体制的步伐。1887年7月7日,朝鲜国王采取先斩后奏的策略,“派闵泳翊为出使日本大臣,金嘉镇为参赞”^[6]。8月3日,“往驻日本东京,妥办交涉事宜”。这是朝鲜近代向外国派出的第一个驻外公使团。8月11日,朝鲜外署督办照会袁世凯,通报此事,并一改惯例,竟然要求由袁世凯转递致总理衙门、礼部、北洋大臣咨文,“兹有咨文三通,谨行送贵总理查收转达可也”^[7],表现出完全的独立性。朝鲜国王此举的用意显然并不止于此,而是借此试探清廷的态度,为后续的更大行动,投石问路。遗憾的是,袁世凯、李鸿章并没有识破朝鲜国王的计谋,也未采取任何应对措施,中朝之间最大的外交纷争遂接踵而至。8月20日,朝鲜国王故计重施,任命“朴定阳为全权大臣往美驻扎,沈相学为全权大臣往英、德、俄、义、法随便驻扎”^[8]。盘桓中朝之间数年之久的“朴定阳事件”随即上演。

清政府对朝鲜遣使欧美一事高度关切,深知朝鲜此举的用意,是为了“引强邻,背天朝,以与中国抗衡敌体”,“联英、美,结俄、倭,以与各国并驾齐驱”^[9],遂采取了诸多反制措施。朝鲜国王则实施软磨硬缠之计,虚假恭顺之策,恶意抗拒之招。朴定阳一行8人最终于11月16日走出国门,12月28日,抵达美国旧金山,1888年1月9日,到达华盛顿,13日,拜见美国国务卿,17日,向美国总统递交国书,完成了使命。清政府所采取的所有反制措施均宣告失效。此后,在对朴定阳的追责、朴定阳官职的任命等问题上,朝鲜无不表现出罕见的强硬,致使清政府所提严惩、罢免朴定阳的要求全部落空。1891年12月14日,朝鲜领议政沈舜泽照会唐绍仪,接受清政府的指令,“朴定阳虽准起用,不得委以重任,并不得再充使臣之职”^[10]。沸沸扬扬的“朴定阳事件”至此划上了休止符。

从1887年8月到1891年12月,中朝两国围绕“朴定阳事件”,进行了长达4年之久的交涉。仅就结果而言,朝鲜成为了最后的赢家,实现了遣使美国的夙愿,成功挑战了宗藩体制,彰显了争取外交自主的决心与意志。但实际的收效甚微,并没有达到朝鲜国王遣使海外的预期,朝鲜的国际地位并没有因为朴定阳出使美国而提高。这点可从东西方国家驻朝使领的状况得以证明。1892年之后,派有驻朝公使的国家依旧只有美国、日本、俄国,英国、法国、奥匈、德国等在朝鲜仍然只设立归驻华公使管辖下的总领事。换言之,朝鲜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并没有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欧洲国家仍将朝鲜

[1][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天津谈草》(93),东国大学校出版部,第208页。

[2]《袁世凯全集》第2卷,第453页。

[3][韩]高丽大学亚细亚问题研究所编《旧韩国外交文书》第10卷[美案1],第30页。

[4][韩]《旧韩国外交文书》第10卷[美案1],第314页。

[5][6][7][8][9]《袁世凯全集》第1卷,第376页,第351页,第369页,第372页,第362页。

[10]《朝鲜领议政沈舜泽照会唐绍仪》,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朝驻美使朴定阳请假返国卷》,[台]“中研院”近代史所藏“驻朝鲜使领馆档——袁世凯”,全宗:01-41,宗号一册号:016-04。

视为中国的藩属国家。深入探究则会发现,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除了欧洲国家现实利益的考虑之外,清政府确立的“不沾不脱”对朝原则在此期间发挥了重大作用。“不沾不脱”原则从1882年推出后,经受了“壬午兵变”、“甲申政变”、“巨文岛事件”的检验,突破了传统朝贡体制的樊篱,获得了国际社会尤其是与朝鲜利益攸关国家的普遍认可,成为东亚地区特定时空之下的国际准则。这样一来,就极大地压缩了朝鲜在国际舞台上回旋、腾挪的余地,消解了朝鲜推行“以夷制中”的企图。可以说,朝鲜国王坚持遣使美国,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收获。朴定阳10个月后即于1888年11月19日启程回国,仅留书记官李荣夏临时代理^[1]。派驻欧洲五国公使赵臣熙则逗留香港,并于1890年2月,擅自回到了汉城^[2]。遣使后的朝鲜仍旧是一个不为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独立国家,留给朝鲜国王的只有无尽的哀叹与难言的凄凉。

二、口惠实不至:令朝鲜国王失望的美国人

“巨文岛事件”之后,英、俄暂停争斗,各取守势,朝鲜局势总体趋于稳定。美国则乘机频频发难,试图抢占朝鲜半岛乃至东亚地区的话语权,成为了半岛局势的最大搅局者。除教唆、鼓动朝鲜遣使欧美外,各色美国人还纷纷介入朝鲜的内政外交事务,影响着朝鲜的现行政策。可以说,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朝鲜历史进程中充当了主角,美国人的身影在朝鲜历史中处处可见。

总括1885年-1892年间在朝鲜的美国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美国驻朝公使,主要是福久、丹士谟、赫兑、赫德;美国官员,主要有薛斐尔、李仙得、墨贤理、德尼;美国商人,主要有葛累好士等。这些背景各异的美国人,尽管职责不同,但却怀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肢解宗藩体制,蛊惑朝鲜脱离中国而独立。

以福久、丹士谟为代表的美国驻朝公使,在策动朝鲜的独立问题上,主要承担着为朝鲜扫清外交障碍的责任。福久原为美国海军中尉,1886年7月起,临时担任美国驻朝代理公使。任职期间,鼓动朝鲜创办海军,聘请美国军事教官、教师,设立育英公院,后与来朝的薛斐尔,串通一气,勾结俄国驻朝公使韦贝,教唆朝鲜国王脱离中国而独立,曾公开宣称:“韩贫弱不能自主,时受制于中国,各国每派代理公使及领事等官,亦隐不以敌体之国相待。若韩能派公使全权分赴各国,各国亦必派真正公使驻扎朝鲜,各有权势,遇事牵制,中国自不敢以属邦视之。”^[3]福久成为鼓动朝鲜遣使海外的第一个西方人。史称:“韩王之谬于自主,至死不悔,亦大半误于福久之议。”^[4]当中朝两国就朝鲜以何种方式遣使美国而激烈缠斗之际,时任美国驻朝公使丹士谟于1887年9月27日照会袁世凯,谴责清政府违犯了《美朝修好通商条约》的相关规定,是一种违法之举,强烈要求清政府停止干预^[5],试图从外交层面,逼迫清政府让步。

身为美国军官的薛斐尔、李仙得则直接介入朝鲜内政、外交,影响朝鲜国王的决策,挑战中朝宗藩关系。薛斐尔本是美国远东舰队司令,1882年5月22日,代表美国政府与朝鲜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成为打开朝鲜门户的西方第一人。卸任后,薛斐尔长期停留日本。1886年受邀来朝,担任朝廷要职,与福久、俄国驻朝公使韦贝密谋策划,造谣中伤袁世凯,鼓动朝鲜国王将其撤换^[6],为朝鲜摆脱中国实现独立创造条件。“著名无赖”李仙得原本是美国海军军官,1874年鼓动日本侵台,后长期居住

[1]《袁世凯全集》第2卷,第85页。

[2]戴逸、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23),《电报三》,[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3][5]《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2361页,第2352-2353页。

[4]《袁世凯全集》第1卷,第356页。

[6]《李鸿章全集》(22),《电报二》,第193页。

日本。1890年3月,被朝鲜国王委以高官,授予“二品衔,充内务协办”^[1]。任职期间,李仙得策划驱逐中国海关所派各关税务司,谋取朝鲜海关总税务司^[2]。墨贤理、德尼则是另一种类型的美国官员。墨贤理,美国人,长期在中国海关任职,曾担任过台湾税务司、汉文副税务司等要职,1885年10月,经李鸿章委派,担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此人内敛平和,城府极深,颇得中朝人士的好感。但据袁世凯多年观察,“贤理美人,喜谈自主,惟情阴复,前年劝韩派全权、开平壤,皆极深密,人不能窥,尤不肯服过,而坚以自信”^[3]。德尼曾任美国驻天津、上海领事,1886年3月,经李鸿章推荐,出任朝鲜二品衔“协办内署外署,掌交司堂上”,参与朝鲜内政、外交决策。入朝不久,德尼就背叛了李鸿章,变成了鼓动、教唆朝鲜国王反清自立的助推者,“屡劝王”,“须派公使分往各国,乃能全自主体面”^[4],加速了欧美使臣的派出。在朝鲜国王是否顺从清廷旨意严惩朴定阳而犹豫不决之际,德尼挺身而出,坚决与中国为敌,为朝鲜国王撑腰打气,提醒国王不要理会清政府的抗议,坚持授予朴定阳高官,显示朝鲜寻求独立主权的决心与意志。并警告说,如果屈从于清政府的压力,朝鲜将难以摆脱中国的控制,难以在国际舞台上赢得尊重与独立自主之国的认可。“德尼力言于王,如听华罪朴,韩即非自主国,各国必不接交国使。必即须补朴显职以示各国,华必无可如何。”^[5]《清韩论》的出版发行,则标志着德尼唆使朝鲜反清自立活动达到了顶峰。该书完稿于1888年2月,8月首先在汉城印刷出版,9月又在上海发行^[6]。该书首次从国际公法的视角,回答了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对中朝宗藩关系的质疑,论证了“朝贡国”与“属国”在国际法意义上的区别,指出朝鲜之于中国,仅仅是“朝贡国”,而非国际公法保护下的“属国”。“朝贡国”注重的是交往礼仪,“属国”突出的是主权独立。强调朝鲜是一个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主权国家,宣扬“清韩两国论”、“清韩平等论”、“朝鲜独立论”,否定了清政府介入朝鲜内部事务的合法性,肯定朝鲜追求独立自主的正当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尼的《清韩论》是西方观念的集大成者,给中朝宗藩体制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与撕裂。

商人代表葛累好士,朝鲜称其为具礼,原本是美国巨富,“以开矿起家,颇干练”,曾担任美国驻日本横滨总领事,与李仙得关系密切。1890年8月31日,葛累好士先期来朝鲜考察^[7]。9月14日后返回朝鲜。1891年1月4日,朝鲜任命葛累好士为内务协办,取代德尼,“承办外国法律事”^[8]。任职期间,葛累好士主要干了两件大事:其一,起草文本,与日本签订《渔采章程》。其二,参与主持旨在脱离中国的贷款活动^[9]。

美国人在内政外交上的全面介入,契合了朝鲜国王久谋独立的心愿,使其依稀看到了自主的美好前景。然而,随着1892年的到来,朝鲜国王盘算数年间的苦心经营,猛然间发现: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朝鲜依旧是一个不为国际社会承认的藩属国家,中国力量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依然横亘在朝鲜面前,朝鲜的国际地位并没有因为派使美国而提高,反而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独立自主宛如天上的月亮,可望不可及。当初信誓旦旦的美国人变成了一伙口惠实不至的家伙,令人失望之极。以福久、丹士谟为代表的美国驻朝公使们,虽从国际外交的层面公开承认朝鲜为独立之国,但在中、英、俄、日等国的联合制衡下,却鲜有成效,以维持中朝宗藩体制为旨归的“不沾不脱”原则,依然是列强各国遵循的东亚国际准则。李仙得、墨贤理策划的朝鲜海关自主企图也是胎死腹中,墨贤理并因

[1][2][3][7][8]《袁世凯全集》第2卷,第250页,第247页,第454页,第338页,第395页。

[4]《袁世凯全集》第1卷,第372页。

[5]《李鸿章全集》(22),《电报二》,第521页。

[6][日]冈本隆司:《属国与自立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86页。

[9]“闻黎仙得将赴日,商改《渔采章程》,拟将济州驳删,并加渔税。賫有文件,系葛累好士所撰云。查黎、葛时谋贷款理财,然各国均知韩情,必难有成。”《袁世凯全集》第2卷,第469页。

此丢掉了朝鲜海关总税务司的要职。在总理衙门、李鸿章、袁世凯与赫德的共同操作下,墨贤理成为担任朝鲜海关税务司的最后一任美国人,此后担任朝鲜釜山、元山、仁川分口税务司和朝鲜总税务司的洋员,全部变成了忠于中国的英国人、德国人,朝鲜海关管理大权依旧牢牢地掌控在中国政府手中。以葛累好士为代表的美国商人,同样也是开空头支票的行家里手,被朝鲜国王寄予厚望的贷款计划始终是杳无音信。德尼则更让朝鲜国王由失望蜕化为痛恨。德尼担任朝鲜政府顾问之初,先是为朝鲜国王撑腰打气,顶着巨大压力,坚持派朴定阳出使美国,后是撰写《清韩论》,论证朝鲜独立自主的合法性,从根本上瓦解中朝宗藩体制。然而,到头来却为了区区数万元欠薪,出卖了自己的人格,先是私下与上海海关道龚照瑗、上海道台马建忠签订秘密合同,拿中国政府的钱,离开朝鲜回国,后又与朝鲜政府对簿公堂,打起了追讨欠款的国际官司。更有甚者,当朝鲜国王将其罢官削职,扫地出门时,德尼竟然背叛了自己,背叛了恪守的法律至上理念,彻底否定了《清韩论》,扬言“回美后必劝美廷以华属待韩,改派领事来驻”^[1]。时人纷纷谴责德尼品行卑劣,所撰《清韩论》“册文乃为钓金之具,是前之所谈俱属无稽”,私订密约一事,将成为德尼一生的污点,“终身之累也”^[2]。

鲜活的事实警示朝鲜国王,19世纪80年代后进入朝鲜的美国人,有些人是基于基督教的“天职感”、“使命感”,欲图把朝鲜引入西方主导下的文明世界。但就整体而言,来到朝鲜的美国人都有一种世俗的却又难以启齿的梦想,即建功立业,发财致富。当“圣人”况且原本就不是圣人,面对权与利的诱惑之时,所谓的圣人便撕去了圣人的面具,显露出人的本性。1886年3月到1891年1月,德尼与福久、薛斐尔、丹士谟、龙士、李仙得这些本是同根生的同胞,为了争宠获利,屡屡上演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争斗戏。这些美国人与其说是帮助朝鲜独立自主的引路人,勿宁说是一批怀揣私欲的投机者。失望之余,朝鲜国王蓦然发现,世界之大,友邦甚少,朝鲜通往独立自主的前路是山重水复,几近绝地。更为糟糕的是,一边倒的亲美政策,招致了东西方列强的联合打压,使朝鲜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险恶,加剧了内部危机的爆发。调整治国安邦策略,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自然也就成为朝鲜国王无可奈何的抉择。

三、财政危机成为压垮朝鲜国王的最后一根稻草

19世纪80年代之后,朝鲜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巨额的对日赔款。根据1882年8月30日签订的《济物浦条约》,朝鲜赔偿日本在“壬午兵变”中的损失共计55万元。1885年1月,根据《汉城条约》,朝鲜再向日本支付“甲申政变”中的各项损失13万元^[3]。巨额的对日赔款加重了朝鲜的财政困难。二是王室的挥霍无度。朝鲜国王、王妃皆是穷奢极欲之人,喜新好奇是其秉性。1885年12月,国王“请美人办电气灯,将遍置宫中,尚未运到,闻需费三万余金”^[4]。1886年之后,“又派小人分赴中国、东洋,购置珍奇玩好之物,目不暇给”^[5]。闵妃“日事糜费,各库一空如洗,兵饷亦将不给,百官俸禄已欠三个月未发,犹购轮船及西洋玩好以娱耳目”^[6]。1888年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朝鲜国王竟聘用俄、法建筑师,设计建造一座耗资数十万元、“方十五丈,高三层”的洋式宫殿^[7]。三是巨大的新政开支。19世纪80年代,朝鲜效仿学习中国的“洋务运动”,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机器设备,组建了典圜局、种桑局、制药局、邮政局、电报总局等;购置枪支弹药、炮舰,编练新式陆海军;买进新式轮船,成立了“转运总局”;创办了“育英学堂”、“梨花学堂”、“济众堂”等西式学校、医院。仅雇用洋人技师、教习的费用,“每月供给约需万金”^[8]。1886年8月,为筹办海军,从日本购买的“志麻丸”号轮船,船

[1][2]《袁世凯全集》第2卷,第378页,第71页。

[3]《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1612-1613页。

[4][5][6][7][8]《袁世凯全集》第1卷,第69页,第267页,第257页,第72页,第267页。

体“甚旧且小”，价格就达二万元^[1]。浩大的开支，巨额的赔款，最终使朝鲜这个“征赋不过二百万”，“万国中最贫弱”^[2]的国家陷入了难以为继的财政危机。“各洋匠薪俸累月不给，百官俸禄经年不发，兵饷亦随时凑措，几难支持。贫弱支绌，实为数年来所未见之事。”^[3]

为度过财政危机难关，朝鲜国王只得大借外债。1885年12月，朝鲜以海关作担保，以12%的高额年息，向德国世昌洋行借款10万元^[4]。同年，仍以海关作担保，以10%的年息，与英国怡和洋行签订了10万元的借款合同^[5]。到1887年2月，朝鲜外债竟高达“一百六七十万元”^[6]。随着债主们的登门索赔，朝鲜陷入了名誉扫地的窘境。世昌洋行在屡次追讨无果之后，竟派人围堵朝鲜官府，厉声责骂。史称“积欠太多，财用愈绌，西人相继催索，无以偿报，屡因此受侮于人”。

为摆脱困境，维持国家运转，朝鲜国王大致采取了三项措施。其一，卖官鬻爵，聚敛钱财。史称：“外官自监司以下，均非纳钱不能拜官，每监司多须十万两，府郡县官亦计其缺之优劣，以议纳钱之多寡。”^[7]更有甚者，作为国家神圣象征的科举取士制度，也蜕变成朝鲜国王敛钱的工具。1887年2月，平安道“取文科十二名，每名索钱一万五千串，共十八万串”^[8]。国王的无道，败坏了社会风气，致使朝鲜“上下竞利，贿赂公行，卖官鬻爵，举国若狂”^[9]。其二，铸新币，废旧币。1884年，朝鲜政府外交顾问、海关总税务司穆麟德在国王的支持下，成立“典圜局”，废弃“当百钱”、“当五钱”，推行银本位制，“铸造了具有500个‘常平通宝’价值和100个价值的银币、具有25个价值的金铜币、具有5个价值的赤铜币和具有1个价值的黄铜币”^[10]。其中仅铜币就“约十余万缗”。但由于财政混乱，使用不便，外加新币嵌印“大朝鲜开国若干年”字样，“有碍奉朔称藩之义，故王有所疑忌而不敢轻用也。”1887年11月停止铸造^[11]。第一次币制改革失败后，朝鲜又于1891年底，向日本商人增田信之借款25万元，共同铸造新币，“一半即在大阪制造，一半置机器运韩在典圜局制造”^[12]。开工不久，即告夭折，朝鲜向日商支付了15万元的赔偿金。为此，朝鲜国王动用了私房钱，“特由私储库内拨出金沙元宝铜钱等物，折作十五万元”^[13]。两次铸造新币，不仅没有挽救财政危机，反而让朝鲜财政困难雪上加霜。其三，续借外债。1889年4月，朝鲜国王委派德尼负责向外国贷款。几经周折，德尼与法国驻朝公使葛林德初步达成贷款意向，“初议贷百万，嗣议二百万，将以百三十万偿德、美、日商及中国商局、电局各债，以七十万为浪费之需”。朝鲜以海关税收、矿山作抵押^[14]。终因天不作美，向法国贷款功败垂成。朝法两国因法国公使佣人殴打朝鲜官族一事，关系恶化，导致朝法贷款告吹。朝鲜外务署督办赵秉稷称，贷款“必可中止”^[15]。此后，朝鲜将借款的目标转向英美国家。7月初，朝鲜国王“密派近臣韩圭高等在德尼处日夜商属，令其在美商或英商汇丰洋行贷款二百万，以伸前议”^[16]。肩负重任的德尼虽费尽了种种心机，先后向法、德、英、美申请乃至乞求贷款，最后却都铩羽而归。到1889年底，德尼贷款以失败而告终。1890年3月，李仙得从日本来到朝鲜，夸下海口，“许韩贷美债二百万，以海关作保抵，韩王甚宠信”^[17]。朝鲜国王遂授予李仙得二品衔，取代德尼，担任“内署协办”^[18]，全面负责借款。4月，李仙得在国王的授权下，以创办朝鲜国家银行的名义，奔赴日本，商借150万元^[19]。碰壁之后，李仙得又赶往中国，向在沪英美商人借款。6月，“黎(李)仙得电告韩廷贷款无成，王甚怒”^[20]。至此，朝鲜国王寄予厚望的前后两次借

[1][2][4][5][6][7][8][9]《袁世凯全集》第1卷，第203页，第238页，第69页，第70页，第275页，第267页，第275页，第355页。

[3]《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2305页。

[10]〔韩〕姜万吉：《韩国近代史》，第198页。

[11][12][13][16][19]《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5卷，第2566页，第2945页，第3132页，第2624页，第2780—2781页。

[14][18][20]《袁世凯全集》第2卷，第113页，第250页，第303页。

[15]《李鸿章全集》(22)，“电报二”，第498页。

[17]《李鸿章全集》(23)《电报三》，第23页。

款,终因朝鲜有“素喜拖债,远近共知”^[1]的国际不良贷款信誉,外加清政府的有效干预,而归入失败。

贷款失败,后果严重。从长远来看,严重挫伤了朝鲜国王争取国际社会承认的信心。朴定阳一行之所以数月后即离美回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朝鲜无法支付长期驻美的费用。赴欧洲五国公使赵臣熙同样因为经费不足的原因,先是长期停留香港,最后擅自回国的。“韩驻美、倭各员,皆以乏资为请,王时不能应。近日无派五国使议。”^[2]就眼前而言,美、英、法、日等国拒绝贷款,等于切断了朝鲜财政急待输血的管道,致使朝鲜财政危机恶性加速,国家几近崩溃的边缘。这为朝鲜调整对华政策提供了可能性。

四、中国恩威并重的策略彰显功效

面对朝鲜愈演愈烈的自主行动,清政府秉持“不沾不脱”的原则,极力维护宗藩体制,挽救中朝关系。对“朴定阳事件”长达4年之久的持续追讨,就是清政府施展威严的体现。尽管未能阻止朝鲜遣使欧美的行动,但清政府的每一次追讨,实际上还是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清朝大军两次扫庭犁穴、征服朝鲜的历史,如同挥之不去的梦魇,一直长存于朝鲜历代国王的记忆中。此时的国王李熙自然也不例外。二百多年臣服清朝的史实,使国王李熙内心对清朝充满畏惧感,尽管此时大清王朝表现出了某些衰落,但在整个朝鲜王朝的心目中,大清依旧是一个强国、大国,这也就是国王李熙虽然早有背清自立之志,却每每在关键时刻低头屈服的原因所在。尤其是当独立自主行动仅获得了美国一国且也只是道义、舆论上的支持,而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却表现出更具现实意义上的反对与排拒之时,朝鲜国王自然也就不敢无视清政府的警告。

清政府在向朝鲜展现威严的同时,还积极推行德化政策,消弭朝鲜的敌意,以解朝鲜的燃眉之急。具体来说,就是在朝鲜最需要帮助、救济的时刻,清政府不计前嫌,伸出援助之手,频频向朝鲜国王示好。1892年前后发生的三件大事,见证了清政府对朝友好的心迹。

清政府对朝鲜赵太妃葬礼的妥善处理,彰显了“厚往薄来”的宗藩传统,赢得了朝鲜国王的好感^[3]。1890年6月4日,朝鲜国赵太妃薨逝。按照惯例,朝鲜先派讣告使来华通报,清政府再派正、副钦使,携祭典文书、物品,前往汉城吊赙,朝鲜国王“例须郊迎”。因担心“外国环观,露华属凭证,损其自主体面”^[4],朝鲜国王遂以国力贫弱为由,提议免派敕使,一切从简。清政府在遵从礼制的前提下,基于朝鲜财政困难的现实,宣布敕使一行的费用全部由中国承担,严令正、副敕使续昌、崇礼一行,“概不准收受”朝鲜的任何馈赠,一经发现有勒索行为,将严惩不贷,并电示驻朝商务委员袁世凯监督执行。从11月6日登陆仁川,到15日离开朝鲜,续昌、崇礼一行可谓是秋毫无犯,“并多赏赉,韩甚感谢悦”,清政府维护体制,体恤属邦的做法,赢得了朝鲜百姓的颂扬,“称为数百年所未有”^[5]。12月6日,朝鲜国王召见袁世凯入宫,当面表示谢意。

清政府在“防谷案”中的通力配合与鼎力相助,令朝鲜国王感动不已。1888年秋天,朝鲜发生严重的灾荒,朝鲜发布通告,到11月底前限制粮食出口,此为朝鲜历史上的“防谷令”。自接到通告之日起,清政府不仅严格遵守,并且应朝鲜政府之请,对从中国运往朝鲜的粮食“特准免税出口”^[6]。在整个“防谷令”期间,在清政府的精心调度下,数百万石粮食,从上海、天津,源源不断地运往朝鲜各港口,极大地缓解了朝鲜灾荒。口称朝鲜为独立平等之国的日本的表现,却与中国大相径庭。1891年12月,日本驻朝公使梶山鼎介代表在朝日商,向朝鲜提出十四万七千余元的赔偿要求,称“防谷令”的颁布,

[1]《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5卷,第2810页。

[2][4][5][6]《袁世凯全集》第2卷,第483页,第312页,第376页,第68页。

[3]崇礼:《奉使朝鲜日记》,光绪十九年(1893年)刻本,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

给日商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朝日之间为此进行了两年之久的反复交涉。1893年2月,新任驻朝公使大石正巳以朝鲜逾期不赔为由,本息合计,索赔17万余元。朝鲜外署督办赵秉稷在无奈中向袁世凯求救。袁世凯遂于3月9日,代拟照会,谴责日本不念邦交,虚报勒索,答应只赔偿四万余元^[1]。袁世凯的介入虽未能从根本上为朝鲜挽回损失,6月朝鲜同意以11万元结束赔偿,但袁世凯的鼎力相助,清政府对朝鲜灾荒的大力援救,则让朝鲜国王在比较中见证了亲近远疏,增加了对清政府的依赖感。

在朝鲜经济几近崩溃之际,清政府适时伸出了援手。最初在商讨向外国借款时,朝鲜国王听信了美国人葛累好士的谗言,“华譬如大木内朽,正宜远避,防其折压,如向贷款,是又引近。且将关税抵偿,是以关税尽授华人,终必为华据取,切不可入其术中”^[2],将贷款与国家独立自主联系在了一切。这就是朝鲜为何只向欧美日贷款的原因所在。出乎朝鲜国王意料的是,原本信誓旦旦支持朝鲜独立的美、日等国,却都作壁上观,坐视朝鲜财政持续恶化。让朝鲜国王绝没有想到的是,清政府搁置正在争执的“朴定阳事件”,愿意低息贷款给朝鲜。被财政危机搞得焦头烂额的朝鲜国王在无奈与感动中同意向中国借款。1892年10月29日,出于维护宗藩体制和朝鲜国王虚荣心的双重考虑,由清政府出资的贷款,以在朝“同顺泰”号华商谭以时的名义贷予朝鲜,接受者是朝鲜转运衙门总务官郑秉夏,贷款数额为十万两库平银,“按上海八月二十三日(阳历10月13日)市价,折英洋十四万八千三百六十七元九角五分”^[3]。此款主要用于偿还德国世昌洋行的欠债。11月24日,清政府又以同样的方式向朝鲜贷款十万两^[4]。前后两次借款,帮助朝鲜偿还了德、美、日、英等国商人的欠款,暂且解除了朝鲜外部的财政危机。

清政府充满人性化的善举,让朝鲜感受到了清政府的善意与力量。它在化解朝鲜危机,帮助朝鲜渡过了难关的同时,如同潺潺暖流,稀释着朝鲜国王淤积于胸的怨恨、敌意。面对外部世界的封锁,民怨四起的内部危机,为了稳定政局,确保统治,朝鲜国王在1892年之后,调整国家战略,决意缓和矛盾,亲近中国。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便出现了看似矛盾,实属必然的现象。朝鲜国王一反常态,大力靠拢中国。作为回应,清政府加大了对朝鲜的扶持力度。中朝关系实现了由冷变暖的历史性跨越。

朝鲜推行亲华政策,是从打感情牌开始的。1892年5月,袁世凯带着丧母后的悲痛回到了朝鲜。26日,朝鲜国王特地邀请至王宫,唏嘘不止,尽表哀思,并送交二百两赙银。会谈结束后,朝鲜国王坚持留袁世凯在宫中吃饭。闵妃因不便出席,除赠送同数额的赙银外,还特派贵戚作陪^[5]。袁世凯自1885年10月入朝以来,在长达7年的时间内,受邀入宫吃饭,屈指可数。可何况因袁世凯坚守宗藩体制,朝鲜国王曾数度致函李鸿章,要求将其撤换。此次留宫吃饭,释放出了朝鲜国王改善中朝关系的信号。

派遣留学生来华学习,彰显朝鲜国王亲近中国的诚意。1893年4月8日,朝鲜国王致咨李鸿章,对李鸿章给予的指导、庇护深表谢意,言称“敝邦逼处强邻,久虞耽视,幸赖阁下统筹时局,俾与各国订约通商,隐资防范。十数年来,鲸波无警,中藏高惠,实与援护,大德永矢不谖”。将此前的背清自立行为,归咎于误听欧美列强的挑拨,并对此表示了深深的忏悔,内称“年前以西人等鼓弄浮言,惑闻远近,每经回首,殊多憾惜”。最后,请求接纳朝鲜留学生,来天津学习近代武器的制造与使用。朝鲜国王表示,目前列强环伺,时局动荡,为求自保,亟待储备新式人才,“闻阁下创立武备水师机器各局堂,规制精详,洵为储材之根本,钦佩久深。刻拟检选少年子弟才堪造就者若干名,送请阁下分发各局堂联席肄业,俾得材成有用,为将来捍御之资”^[6]。

朝鲜国王的此举明显带有两层用意:其一是深切感受到了来自东西方列强侵略的威胁。在信中,朝鲜国王剖析道: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东端的开工,俄国兵锋正逼近北部边陲;朝日《渔业章程》的签

[1][2][3][4][6]《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5卷,第3120-3131页,第3045页,第3057-3058页,第3116页,第3146页。

[5]《袁世凯全集》第2卷,第488页。

订,则使日本的捕鱼船纵横东海,朝日渔民间的冲突节节升级。正所谓“北邻铁路渐逼边陲,东海通渔滋扰各岛”^[1]。局势一旦失控,朝鲜将会有灭顶之灾。为防不测,朝鲜必须未雨绸缪。其二,婉转表达了对清政府的亲近、依赖。朝鲜国王此次提请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准确地说是朝鲜历史上的第二次。1881年11月,在近代中朝关系最好的时期,朝鲜国王派出了69人的留学生团队,前来天津学习武器装备的制造^[2]。时隔12年之后,朝鲜国王再派留学生来华学习,一个重要的用意就是借此修复因遣使欧美而一度恶化的中朝关系,表达对清政府的亲近、依赖之情。

委派正式驻津委员,成为中朝关系变暖的标志。根据1882年《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两国互派商务委员驻扎汉城或天津。碍于宗藩体制的规定,朝鲜驻津委员,名义上管理商务,实际上就是朝鲜政府近代在中国设立的最高外交官员,承担着沟通两国,加强联络的使命。从1883年首任驻津委员金善根起,朝鲜国王就高度重视驻津委员的选派,皆委派高官就任。1890年之后,随着朝鲜自主意识的萌生,朝鲜国王不再委派正式驻津委员,只设有临时代理委员。1893年4月28日,朝鲜署理驻津督理通商事务边锡运递交照会,称奉国王之命,回国养病,由李冕相代理驻津委员^[3]。5月7日,李冕相向李鸿章呈奉国王咨文,内称:“敝邦驻津督理通商事务金明圭前经调回开缺,迭派属员接署,于今三年,亟应改派正任前往驻扎,以昭慎重。查有陪臣礼曹参判李冕相明练周慎,可合督理之任,兹特委派前往,照常视事。”^[4]至此,二品大员李冕相成为缺失三年之久的驻津委员,标志着朝鲜重新回归传统对华外交模式。

对于朝鲜国王的一系列善意举动,精明的李鸿章随即做出了积极回应。1893年5月4日,李鸿章在回复朝鲜国王的信中,畅谈中朝两国唇齿相依,休戚相关,是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希冀两国和衷共济,“患难相恤”,亲同一家,共度时艰;称赞朝鲜国王选才留学,实为“思虑深远,钦佩何穷”;剖析朝鲜三面环海的地势,理应创办海军,但朝鲜目前的财力,难以大规模购置“铁舰快艇”,建议大力编练陆军。在信中的最后,李鸿章检讨了朝鲜第一次派留学生来天津学习无果的原因,就在于学生年龄偏大,“年已长大,时过后学,勤苦难成”,明确要求此次来华留学的学生,年龄必须在20岁以下,具备一定的汉语基础,“方便指授”。朝鲜学生将被分派到北洋武备学堂、北洋水雷学堂、北洋鱼雷学堂,与中国学生同班学习。将来再从学业优良者,挑选一二入北洋水师学堂受教^[5]。

与此同时,鉴于朝鲜列强虎视鹰瞵、民乱四起的现实,清政府决定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1893年5月19日,北洋大臣李鸿章指令天津军械总局调拨军火给朝鲜:“宁局两磅后膛熟铁过山炮八尊,随炮炮门车架器具零件均全,配拨包铅开花子一千颗,铜五件,全包铅实心子八百颗,铅群子二百颗,铜管门火六千枝;后膛毛瑟刀头步枪五百杆,背枪皮带五百根,皮腰带五百根,铜扣全皮刀插五百个,皮子盒五百个。机器局造毛瑟枪子十万粒。”此外,还赠送了六门德国克虏伯七生半过山炮,若干枝德制毛瑟枪^[6]。6月6日,这批军火由“操江”号运抵仁川,交付朝鲜^[7]。朝鲜军队据此,暂时平定了“东学党起义”。朝鲜国王对清政府在危难时刻的慷慨援助,“极忻感”^[8]。

五、结 语

中朝关系自1888年起,在经历了数年间的断崖式降温之后,到1892年却峰回路转,急剧升温,实现了由冷变热的转变。这种看似矛盾、不合逻辑的演化,细细探究,实则具有某种必然性。就朝鲜而言,在追求独立自主热情的驱使下,感动于东西方列强的独立平等之言,盲目接受列强别有用心的好意,轻信了日、美等国的真诚与道义,将其视为实现国家独立的救星,并在1885年“巨文岛事件”之后,

[1][3][4][5][6][7][8]《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5卷,第3146页,第3143页,第3144页,第3147-3149页,第3160页,第3188页,第3160页。

[2]《李鸿章全集》(9),《奏议九》,第545页。

蓄意挑战中国,集中上演了以“朴定阳事件”为主角的遣使欧美争斗剧,致使中朝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然而,折冲樽俎的结果却令朝鲜大失所望,朝鲜并没有因此而跻身于世界独立平等国家行列。其实,朝鲜的受挫在于战略与战术的失误。近代国际政治实际上就是实力与利益的组合体。英国、俄国作为在东亚地区最具实力与影响力的两个国家,在“巨文岛事件”中各得所需,清楚地认识到,东亚局势的平衡很可能因朝鲜追求独立而被打破,并最终损害各自的利益,因而,以英俄为首的欧洲国家对朝鲜的独立自主行动持否定态度。这就等于压缩了朝鲜在国际舞台上的回旋余地,封杀了朝鲜实现独立自主的可能性。而一边倒的亲美政策,则是朝鲜犯下的战术上的失误,使其追求独立自主的活动雪上加霜。19世纪90年代前的美国相对于英、俄老牌列强而言,还只是一个列强世界中的小伙伴,国力远逊英俄,国际影响力无法与英俄相提并论,自然也就难以撼动由英俄掌控的东亚格局。朝鲜过分倚恃美国的后果就是遭到英俄为首的欧洲列强的群殴。到1892年前后,朝鲜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危险境地。日本、俄国从东、北两个方向,明显加快了侵朝步伐;国内的东学党起义则呈愈演愈烈之势。环顾四周,朝鲜可资借用的外部力量只有中国。为求自保,亲近中国成为朝鲜国王无奈而又必然的选择。

清政府基于维护宗藩体制和地缘战略的双重考虑,视朝鲜为“固东三省之后园”^[1],在无力遏制日俄染指的情况下,从19世纪70年代末期,在朝鲜推行“以夷制夷”策略,引进欧美列强,牵制日俄,并初步取得成效。80年代初,基于欧美国家与朝鲜业已签订条约的现实,清政府适时确立了“不沾不脱”原则,划定了中朝两国关系的红线,并使之成为东亚地区特定时空下的国际准则。在朝鲜以遣使欧美为突破口,挑战宗藩体制之时,清政府采取了威恩并重,刚柔相济的策略,在展现威严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抛出主动示好的橄榄枝,尽己之所能,解朝鲜燃眉之急,最终促成了中朝两国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的重归于好。但是,必须清楚地看到,中朝关系在1892年之后的由冷变暖,符合了中国的国家战略,但对朝鲜而言,则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只要国际环境稍有风吹草动,朝鲜必定会再度向宗藩体制发起挑战。

[责任编辑:肖波]

A Cause Analysis of the Improvement in Sino-Korean Relations since 1892

Zhang liheng

Abstract: After signing the USA - Korea Treaty of 1882, Korea started to challenge the traditional suzerain-vassal state and strive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At first, they relied on Japanese, then sought assistance from Russia, further attached themselves to America, and finally created the “Park Jong-yang Incident”. This incident damaged the traditional suzerain-vassal state and Sino-Korean relationship deteriorated quickly. But because of a serious financial crisis of their own as well as Qing government’s pressure and America’s lip service, Korea had to compromise. The Sino-Korean relationship recovered since 1892, and another honeymoon period began.

Keywords: “Park Jong-yang Incident”; the principle of “neither attachment nor isolation”; “Port Hamilton Incident”

[1]《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5卷,第2699页。